

中華民國百年翻譯文學史

賴慈芸
師大翻譯所

近代翻譯文學始自清末。清末以前，中國久居漢語文化圈中心，並不重視翻譯。歷朝雖有大鴻廬寺、四夷館等官方翻譯機構，但主要從事外交及軍事業務，很少涉及文學，譯者地位不高，甚少留名。翻譯向為外人之事，周邊各國如日本、韓國、越南等，自古競相來華學習中文，並將中文譯為該國語言；但由其他語言譯為中文的作品則相當罕見。佛經翻譯常為人所稱道，但其實譯者以外籍僧侶為主，宋朝以後即少有重要譯作，雖然對於中國的語言、戲劇、小說等發展有深遠的影響，但並沒有改變中國對翻譯文學本身的態度。明朝以後耶穌會士入華，譯者還是利瑪竇等外國教士，翻譯主要為宗教及科技作品，亦少見文學作品。

因此清末以降的翻譯文學，是中國史上第一波真正以文學為主的翻譯活動。此波翻譯文學影響極大，除了大幅改變語言之外，現代各文類或由翻譯開始，如現代詩、話劇、兒童文學等是；或受到翻譯的刺激而轉型，如公案小說轉為偵探小說、全知觀點小說轉為第一人稱小說等是。

但要敘述這百年來的翻譯文學史，雖然不乏素材，卻有幾項難處：一是分期困難；二是轉譯甚多，但中介語種未明；三是受到政治干擾，有譯者身分不明及初版年代不明的問題。

先說分期問題。一般近代翻譯文學史多以 1899 年林紓翻譯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為起點，至五四運動為一期，至 1949 兩岸分治又是一期；至 1987 解嚴又是一期。但這樣的分期並不適用於每一位譯者。一位譯者的創作生命可長達半世紀以上，林紓以文言翻譯始，以文言翻譯終，並不因白話文運動而改變策略。但魯迅、周作人兄弟同樣以文言翻譯始，但卻在白話文運動之後改以白話翻譯。因此是否從眾，因人而異。同一時期流行的策略，也未必人人遵循。晚清流行意譯，魯迅、周作人偏倡直譯。1940 年代幾乎人人直譯，傅東華硬是以意譯的《飄》暢銷全國。即使同一個譯者，也未必每本書都採取同樣策略。傅東華的《飄》固採意譯，《猩紅文》卻幾乎字字對譯，甚為難讀。因此分期敘述只能略述時代趨向，個別譯者與個別譯作未必能一體適用。

再說轉譯問題。百年來翻譯的來源語種甚多，雖留學英美歐洲者不少，但要翻譯數十種語種，恐怕還是要借助轉譯。戰前主要的中介語言包括日文、英文、德文、俄文及世界語等，戰後則以英日文為主；但許多譯者並沒有明白交代轉譯本來源，是撰寫翻譯史的另一困難。例如東方出版社在 1960 年代出版的福爾摩斯是透過日譯本轉譯，但書上並未註明。

三是出版資料不明的問題，最為嚴重。1949 年至 1987 年間，兩岸有近四十

年的隔絕。但雖在理論上不相交通，流通的譯本卻有不少是大陸譯者作品，何況還有透過香港等地陸續流入台灣的大陸新譯本。但因為政治因素，出版社往往不署譯者姓名或改以假名，造成譯作初版年與譯者真實身分往往不明。許多經典作品書目資料有數十種翻譯，其實多半是以同一種大陸譯本為底本，有時直接翻印，有時略加修改後出版，因此要研究台灣的翻譯史，還得先查明舊譯源流及抄襲問題。1990年代以後更有大批大陸新譯本湧入，雖不再有匿名出版的必要，但台灣的出版社往往只有繁體字版的初版年，而無簡體字版的初版年，也造成撰寫翻譯史的一大障礙。例如孫大雨和卞之琳的莎士比亞都是1999年才出版繁體字版，但其實孫大雨從1930年代就開始翻譯；卞之琳的翻譯也是在1950年代就完成，與台灣出版年有近半世紀的差距。

在這幾種限制之下，本文大致按照時代與主題敘述，期望能盡可能勾繪出百年來翻譯文學史的面目。1945年以前分兩岸敘述，一到三節為中國大陸翻譯情形，第四節為台灣情形，第五節以後專述台灣發展，時代之外輔以主題為敘述主軸，如莎士比亞的翻譯與兒童文學的翻譯都專節敘述。